

中国近代爱国人物故事丛书

主编：张海鹏 徐辉琪

御侮护疆名臣



● 夏良才 荣文 ● 福建教育出版社

中国近代爱国人物故事丛书

张海鹏 徐辉琪 主编

御侮护疆名臣

夏良才 荣文

福建教育出版社

编者的话

在我们的祖国不断改革开放、追赶世界前进步伐的今天，青少年朋友，你们知道，曾有多少爱国志士、民族英才为此奋斗过吗？

1840年，西方侵略者的枪炮轰开了封建中国紧闭的大门，灾难深重的中国近代史也从此开始。从那时起，许许多多的爱国者开始认识到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为了寻求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道路，他们不畏艰难险阻，甚至不惜献出热血和生命，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也留下沉重的历史教训。

在这套丛书里，我们要告诉青少年朋友的，就是这许许多多民族英才追求、奋斗的故事。他们中有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魏源；有主持变法图强的康有为；有民主斗士；有民族工商赤子；更有为民族的解放与进步而奋斗不息的共产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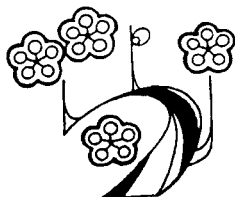
这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专家张海鹏、徐辉琪主编。丛书中收录了中国近代一百多位爱国人物的故事，分成14个分册出版，每册介绍一个领域或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代表人物。无论在编排上，还是内容表述上，它都与已出版的各种爱国人物传记有所不同，不仅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还具有故事的生动性。内容丰富，情节曲折，文笔流畅，亲切感

人,特别适宜青少年朋友阅读。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增进青少年朋友对近代中国的了解,增强民族自信心,认识中国的过去,珍惜今天,为祖国的未来而奋发向上。

1992年12月

目 录



-
- 一、“引得春风度玉关”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故事 (1)
 - 二、“义勇奇男子”
——记中法、中日战争中的刘永福 (40)
 - 三、镇南关前逞英豪
——冯子材援越抗法的事迹 (80)
 - 四、“敢夸砥柱作中流”
——丁汝昌和中日甲午海战 (102)
 - 五、“誓与日舰同沉”
——记黄海海战中的邓世昌 (116)
 - 六、见危受命，血战捐躯
——清军将领左宝贵殉难平壤的故事 (125)
 - 七、为国家争尺寸之土
——台湾义军领袖徐骧抗击日寇的故事 (134)

“引得春风度玉关”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故事

左宗棠是晚清咸、同、光三朝期间的著名军事家、政治家。他最先提出以勇丁替代绿营，由此肇端产生一支又一支湘军和楚军，虽然这支队伍曾经成为镇压太平天国、捻回农民军的主力，但更重要的是在进军陕甘新疆、平定白彦虎分裂主义分子和阿古柏匪帮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左宗棠在年逾花甲之际，不畏强暴，力斥众议，毅然决然担负起驱逐沙俄和英国侵略势力出新疆的重任。他不愧为清朝“中兴名臣”中唯一称得上敢于与外国侵略者斗争的爱国军事名将！

一、经世致用

左宗棠，字季高，1812年11月10日（清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七日）生于湖南湘阴县东乡左家墩。祖父左斐中，教书为业。父名观澜，县学廪膳生，子女六人，宗棠排名第六。左家人口众多，靠祖传数十亩田收租为生，左宗棠父亲常年在外当塾师，以束修贴补家用。1830年，他父亲去世，家境一落千丈，全家十数口人逐渐丧死离散，只剩其兄宗植和他两人。18岁时，

左宗棠就读于湖南巡抚吴荣光设立的湘水校经堂，因成绩优异，获得奖学金“膏火”作为津贴，得以维持清贫、静恬的读书生活。不久，其兄因生活无着不得不客游武昌去谋生。兄弟两人分离悲伤，心情十分沉重。左宗棠曾有诗寄语其兄，叙述了当年的处境和感叹：“一家尽死丧，君我先人遗。念兹并百忧，泣涕以涟汤。……湘水去悠悠，大别山巍巍。颜色不可睹，况复音书稀。故山有黄精，野涧多蕨薇。何当早归来，与君共锄耜”。1832年，左宗棠21岁时纳资为监生，又应本省乡试，幸中试为举人。当时，他因贫无依靠，已入赘湘潭大地主周家为婿。其妻周治端，字筠心，倒是一位工于诗文的贤内助，在日后左宗棠的创业中帮忙不少。

左宗棠从小喜爱读书，6岁读《论语》《孟子》。18岁那年买到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就潜心研究起来，对书中所载的赋役、屯垦、水利、漕运、兵防、马政、盐务、风俗、山川的考订和论证等发生极大兴趣。他还研读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对于书中记载的山川险易与古今用兵之道等内容，留下深刻印象。他读书十分认真，常是粗菜淡饭，自辟一室，四壁悬地图，临窗摆一案一几，终日盘旋其间，苦思冥想，一有心得，便伏案疾书，发一通议论。他这样做持续有一年多时间，故能足不逾槛，却周知天下形势。

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正面临天下激变的关键时刻，一些有识之士已隐约地感到中国有必要革新图强，以跟上时代的步伐，提出了“探世变者圣之至也”的想法，主张广泛了解世界大势，寻找因应之策。如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徐继畲、贺长龄、贺熙龄等，他们大都以研究舆地学开端，讲究经世致用之道，

探考世变轨迹。左宗棠也是在他们的影响之下涉猎舆地之学，并亲自动手绘制地图。他画图已另成体系：先画出中国全图，纵横九尺，再对照《畿辅通志》、《西域图志》、《各省通志》等书，考查山川的分布，疆域的沿革，城池的兴废，攻守的形势。一边绘图，一边配以文字说明，图文并茂，上溯禹贡九州，下至宋元明清。全国图画好后再绘制分省图，工程之浩大可以想见。为了完成这一宏伟计划，他动员夫人周治端一起参加工作，帮助影绘，勾勒草图。通过这一系列实践，他把整个大好河山条理清晰地印入脑海之中，一说起各地山川形势，他可以如数家珍一样脱口而出，倒背如流。他还认为舆地学与兵学是相通的，比如《方舆纪要》一书，对山川、关隘、驿道、城镇等都有详细记录。如作为兵书来读，胸中陈兵百万，即可作临战实验，根据山川形势部署攻守机宜。他圈阅评点各书，对其中疏忽，欠当之处常提出自己的看法。比如，对《方舆纪要》，他认为书中谈到古今成败战例，多言攻而不言防，是一种片面意见，他说大凡山川形势，取守略攻，都应随时势为转移。从研究方舆学到讲究兵法，反映出当时左宗棠的读书风格，即注重经世实学，以成为有用之材，而不拘泥于制艺帖括的科场应酬。更重要的是他具有忧国忧民的爱国心，读书有明确的目的性。他在《题家塾》一联中写道：“身无丰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正因为如此，他在中举后多次入京会试，虽然名落孙山，仕任之途已成泡影，但却没有灰心丧气，恰恰相反，他立志经世致用之学，期待报效祖国的决心却更为紧迫而高扬。

1837年在醴陵渌江书院主讲时，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返里省墓，路过醴陵，看到学馆一幅楹联写道：“春殿语从容，廿

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陶澍对此非常赞赏，问是谁人所作？县令答是左宗棠，陶澍要求召见。左宗棠对陶澍早有所闻，钦佩他在整饬吏治、改革盐务和漕运上的勇气和业绩。一见之后，两人纵论古今，竟致通宵达旦，遂成至交。陶澍留他住一宿，称他是难得的“奇才”。1839年，陶澍逝世，留下遗孀孤儿，乡里有欺侮弱孤者，觊觎其家财产。学政贺熙龄感到应托熟人保护陶家，遂介绍左宗棠到安化陶家当塾师兼总管。左宗棠一口答应下来，并立即来到安化陶家落脚。他在这里一住就八年，与本是世交的陶澍的女婿胡林翼，经常畅谈天下大势，过往甚密，这为他们两人后来合作经营乡勇创造了条件。在陶家，左宗棠最大的收获是在工作之余，得以浏览陶澍有关清代典章的大量藏书以及这位封疆大吏的奏疏、书札等，致使左宗棠受益匪浅，懂得了更多的世故变迁的道理，体察到官场风云的奥秘；但更重要的是引发了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愤意识。譬如，他看到陶澍有一疏稿，陈述新疆边事，称喀什噶尔来的报告提到英吉利商人“从边外过北路售货者”，当时不知其从何处来。这事给左宗棠留下深刻的印象和疑虑。数十年后他在经略新疆事务时才明白，原来“泰西与敖罕（浩罕）潜通，盖已在数十年前矣！”而当时的“封疆诸公”却“从未有议论及之者，亦殊可怪！”可见，清政府对西陲的治理已废弛殆尽，倒是这位身不在朝的家塾仍关心着祖国边疆大事。他结合对中国舆地山川攻防之势的研究，认定新疆在全国战略地位上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早在1833年他赴京会试时就曾写过一首《燕京杂感》的长诗，歌颂了乾隆年间勘定新疆乱事，加强军政设施的功绩：

“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对其后的边庭将帅敷衍塞责，败坏西陲政局感到担忧，认为应加强对西陲的治理和整顿。他赞成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主张按照列宗列祖成例，在那里“列亭障，置郡县”。在诗中，他写道：“橐驼万里输官稻，砂碛千秋此石田。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将军莫更纾愁眼，中原生计亦可怜。”由于他熟悉舆地学，虽然那时还没有去过西北，但对祖国西陲的山山水水却了如指掌，深知要确保京师高枕无虞，必须加强新疆的军政建设，严防中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犯边作乱。他这些高瞻远瞩的谋略，为日后他发誓要与犯边的英俄侵略者作殊死决战，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鸦片战争期间，左宗棠对中英之间的军事冲突十分关心。当时他虽深居安化陶家教书，消息闭塞，只能从长沙好友贺熙龄的来信中得悉一些战局变化的概况。但他预感到侵略者决不会甘作罢休的，必须密切注视局势的发展，筹划对策。他勤奋搜集和阅读有关资料，“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国朝志乘、载记，官私各书有关涉海国故事者，每涉历及之，粗悉梗概。”他在给贺熙龄的回信中常常道及自己对战争的看法和对策，从中可看出他那时忧国忧民的悲愤心情。他认为战争对象世界第一流强国英吉利对中国包藏祸心的入侵是由来已久的，这一回他仅用数十艘战舰就把我沿海守军置于“坐困之势”，造成主客倒悬的不利局面，在这种形势下，我方不应急功近利，必须坚持持久战，发动沿海各省“练渔屯、设碉堡、简水卒、设水寨、讲求火器的攻战，实行坚壁清野，断绝敌军接济。”他这些“制夷”战略战术思想，在魏源的《海国图志》中的《筹海

篇》、林则徐的奏稿中都可看到，反映出他们建立在反侵略基础上的爱国思想大体上是一脉相承的，在很多事情上英雄所见略同。左宗棠对林则徐的为人为国的风格是十分钦佩的，在给好友胡林翼等人的信札中，经常以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表达对林则徐的爱国热忱的真挚的赞扬。从林则徐赴广东查禁鸦片起，他一直关心林的命运，谴责清廷排斥抵抗派、屈辱求和的态度，发出“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的呼声。随着林则徐在官场跌宕起伏，左宗棠也时喜时愤时悲，仿佛左宗棠就是伴随林则徐身边的知音。1849年，林则徐从云南辞官回籍，路过长沙，与左宗棠初见于湘江舟上，两人相见恨晚犹如莫逆，叙谈达旦。左宗棠对这次见面印象极深，赞美林则徐是完满的“天人”，“忧国如家、二万余年遗直在！”他那时就已许愿要以林则徐为榜样，为挽救祖国于危急之中而奉献一切，他后来的行动也证实了这一点！

二、“衰世”英雄

左宗棠注重经世致用，很希望为处于“衰世”的皇上或国家干点实事，但他会考多次落第，无奈只得蛰居于安化陶家，权且做个教书匠。40年代后半期，他已年届而立，仍不知前程究竟如何，难免心里产生焦虑。他一面教书，一面靠积存的束脩，在湘阴东乡买了几亩田地，雇几个帮工，搞点园艺茶桑的副业。他本来就研讨过农书，擅长于农学，一度曾迷恋农圃，自以为可以留连于此，不求仕进。所以自称是“湘上农人”。不过，从他个人性格来说，是不会甘心于这种处境的。他自恃才学高

超，逞强好胜，又学得一套经世致用的本领，总想出人头地，有朝一日抓住一个机遇，在激变的世潮中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

恰在这时，1850年广西爆发大规模的各族农民起义。1851年初，以洪秀全为领袖的广西农民军在桂平金田村揭竿而起，仅三年时间，这支以太平天国为号召的农民武装部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一举席卷大江南岸，攻克东南重镇金陵，改名天京，定为首都。爱新觉罗家的半壁江山已落入农民起义军手中。而皇家主力军八旗和绿营兵，在强大农民军的进攻下溃不成军，一败涂地。正是这时，通晓兵法、方舆的左宗棠自认为有了出头之日，决心为本阶级的命运和前途殊死一搏。1852年夏，左宗棠经胡林翼推荐进入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府，帮助其办理保甲团练。关于举办乡里团练，早在中英鸦片战争期间，左宗棠就有所设想，拟定“山居结邻”之约，即聚宗族亲党，据一险僻之处，“守乡寨，捍山寇。寇至，则挺刃交持；寇退，则弦诵不倦”。这大概是后来举办团练设想的嚆矢。在长沙幕府中，左宗棠曾给胡林翼写信指出，举办团练是可行的办法，不过保甲团练治小盗尚可，对付大股剧寇则“用团练，断宜参用碉堡”。他还认为，官兵屡败是由于“束伍之令不严”，赏罚不明，而将领又不懂“分合奇正”的战术运用，盲目浪战，导致失败；还有就是不善用间谍，常遭敌人埋伏打击。左宗棠首倡以招募丁勇来替代旧有绿营，重新建立新型的地主武装，由此肇始而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湘军”、“楚军”，以及后来的“淮军”，成为清朝新建武装力量的中坚。

1853年，张亮基署理湖广总督，左宗棠随至武昌当差。不

久，张调任山东巡抚，左告辞归家。1854年初，骆秉章任湖南巡抚，招左至幕府，“倚之如左右手”。左宗棠为骆谋划献策，颇得重用，成为他大显身手的机会，以致揽权跋扈，反客为主，一切筹集粮饷、调兵遣将之事，都得由他拍板定案，骆秉章无不言听计从。左宗棠在募练团丁，扩充湘军，与太平军作战中施展浑身解数，起了极其重要作用。当时入值南书房的潘祖荫曾对左宗棠大加赞扬，认为“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1860年，清政府据此命他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于是他在长沙招兵买马，按湘军营制，立新军四营，一营500人；四总哨，每哨320人，别置精锐200人，分八队，为亲兵，号曰“楚军”；又收集老湘军王鑫旧部1400人，共得5000余人，由王开化总领全军营务，刘典、杨昌潜为副职。从此，左宗棠拥有了一支独立于湘军之外的武装力量，犹如猛虎添翼。他率领队伍先开入江西与太平军厮杀，屡立战功。1862年，左宗棠任浙江巡抚，所有该省提、镇以下各官均听其调遣。在浙江，他与入侵的中英混合军，中法混合军相互配合，从东西两个战场围剿浙江太平军。开始，左宗棠对勾结外国雇佣军镇压农民起义还有所顾虑，主张“稍加裁禁，予以限制”。后来看到中法混合军与他一样都是站在“国家立场”帮助夺回浙江的，又夸奖他们“忠义奋发”，引为同道。1864年3月，左宗棠攻陷杭州，太平军在浙江的势力迅速瓦解。同年7月，天京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革命的彻底失败。

左宗棠作为清廷统治集团的一员，他认为对太平天国的作战，是对朝廷的忠诚不二。对当时被儒家道统观念所束缚的士大夫来说，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本来，他对外国侵略者

是仇视的，但当看到这批雇佣军与他并肩作战捍卫朝廷，他就分不清敌友了。今天我们看来，左宗棠镇压太平天国是犯了严重历史罪行，然而究其原委，这又是历史的必然。乱世铸造的英雄，可以是各式各样的。象他那样的满腹经纶，用兵有术的“绝世奇才”，在那极变的“衰世”中，只有去为统治阶级也即为本阶级效劳的一条路！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清政府依靠外国雇佣军帮助和大量购买洋枪洋炮，确立了在武器装备上的极大优势，成为战胜起义军的一大主因。这以后，朝廷内以奕訢为首的洋务派更加重视引进外国军事武装，并开始在国内掀起一股以创办军事工业为主体的洋务热潮。在这当中，左宗棠为时势所推动，成为其中一位得力的创导者。1866年春，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致函总理衙门，建议自设船厂制造军舰。他说：“就局势而言，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为加强海防，改变“人操舟而我结筏”，“人跨骏而我骑驴”的局面，他主张在福州创办造船厂。左的奏章，获得清廷的批准，旋即他在马尾山购买民田200多亩为厂基，聘请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为正、副监督，计划兴建铁厂、大铁船槽，同时设立“求是堂艺局”，即技术学堂，以培养造船技术人才和海军军官。同年秋，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由原江西巡抚沈葆楨任总理船政大臣，正式成立福州船政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新式船舶制造厂。左宗棠虽然未及开工即调离，但他筹建之功是不可没的。后来他仍关心造船厂的成长，在有人主张停产以购船来替代时，他是坚决的反对者，认为停办使“彼族得据购雇之永利，国家旋失自强之远图”。这样，福州船政局终得以维持下去。左宗棠办

洋务的第二项主要内容是创办“兰州机器局”。1873年，他调派制造兵器专家总兵赖长总理其事，从粤浙一带招聘熟练技工到兰州工作，第二年即制造出铜引、铜帽、大小开花子等。以后兰州机器局制造工艺不断提高，能仿造德制后膛螺丝炮，马梯尼枪等新式武器。左宗棠认为“陇中用华匠制枪炮，其长亦差与西人等”，对该厂的产品能与西洋所造的相差无几，深感欣慰，并指出这就是魏源诉说的“师其长技以制之也。”兰州机器局生产的军火，在刘锦堂率部开拔新疆之时曾解到军中应用，在打击阿古柏匪帮和收复新疆的反侵略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三、陕甘总督

1866年9月，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清政府命令他率军平定进入陕西的西捻和陕甘的回民起义。1867年春，左宗棠率部入陕，采取“剿捻宜急，剿回宜缓”的方针，沿着渭河扎营，企图歼西捻于泾、洛之间。由张宗禹率领的西捻军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甩掉合围的官军直趋陕北延安、绥德。同年11月，西捻军从壶口强渡黄河，进入山西。左宗棠把陕军务交给副手刘典，亲率精兵5000跟踪追击。捻军见官军来势凶猛，不作正面决战，却扬鞭跃马，由晋、豫北上，驰骋于冀中平原，左军则驻扎河北吴桥一带严防。次年8月，西捻军在山东茌平县徒骇河被官军打败，张宗禹战死，至此，西捻军全军覆灭。

1868年10月，左宗棠回到西安。当时陕甘各族反清武装斗争方兴未艾，大有燎原之势。其中主要有两大股：一是活跃

于延安、绥德一带的董福祥，裹集溃勇、饥民于一体，号称十余万人马；再是盘踞西南，以甘肃董志原（当时属庆阳府）为活动中心的马正和、白彦虎等回民武装，拥兵达 20 万之众。1869 年初，左宗棠派老湘军刘松山部渡黄河进至绥德，攻打镇靖堡（今靖边县境），董福祥不敌投降。接着，左宗棠率部至乾州（今陕西乾县），指挥各军攻破董志原，占领陇东镇原、庆阳一带，白彦虎等残部西窜青海。左宗棠移驻泾州，（甘肃泾川县），一面在陇东召集流亡，处理善后；一面准备对甘肃反清回民武装发动进攻。

甘肃反清回军共有四大支，即西宁的马尕三，河州（今临夏）的马占鳌，宁夏（今宁夏银川）、灵州（今灵武）一带的马化龙，肃州（今酒泉）的马文禄。左宗棠于 1868 年 7 月先用大军围困马化龙的根据地——金积堡。左军四面合围，强攻外堡，最后采取深沟高垒的锁围法，整整花了两年时间，才于 1870 年底攻陷该堡，马化龙投降，宁夏、灵州一带归于平静。1871 年 7 月，左宗棠挥师直指甘南的河州，他采取步步为营的战术，先是安抚四周回众，断绝叛回的后路，然后分兵猛攻其根据地。1872 年初，马占鳌投诚，河湟地区得以平定。8 月，左宗棠移驻兰州，正式来到陕甘总督衙署上任，这离他最初奉调此职之时已过去整整六年时光。在进攻河州的同时，左宗棠还派刘锦棠部进攻西宁，1871 年底即收复该地，四周如大通、化隆、循化等回变也相继平息，陕回头目白彦虎再次遁逃，远窜关外。1873 年 8 月，左宗棠从兰州来到肃州，亲自督军攻城，在续调老湘军刘锦棠部入阵后，才合力把肃州收复。至此，甘肃境内持续 13 年之久的动乱局面才告结束。左宗棠得到清政

府的嘉奖，晋升为协办大学士，仍留督陕甘。

陕甘回民反清武装的情况十分复杂。在开始时一般都是由于清地方官吏的贪污腐化，搜括过甚引起官逼民反，带有反封建、反压迫的各族农民起义的性质。但这些起义，大多掺杂着汉回的民族矛盾等情绪，加上少数民族宗教上层和封建势力代理人的挑拨、操纵，致使起义本身出现各种各样的局面。有的借机扩充地盘，演变为地方割据势力；有的散布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以反清面目出现，暗中勾结和投靠外国势力，走向分裂祖国的罪恶道路。当然对大多数各族老百姓来说，在清政府或这些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统治下，所受到压迫、欺诈、劳役等仍是大同小异，无甚区别，他们都不过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历史牺牲品。左宗棠在征剿过程中，不分青红皂白屠杀无辜，确实有大量事实根据。但是，也应该看到另一面，当时在新疆由于沙俄、英国势力的介入和挑唆，也出现了动荡不安的局面，其中有各族人民的反清武装起义，也有领导权被上层分子把持，把起义引向叛变祖国、投靠外国势力的分裂主义活动。如果清政府不能平息陕甘的回变，内地与新疆的交通断绝，那么西陲边境的危机就无法解决，新疆也可能独立而去，最终被沙俄和英国瓜分吞并。当时，左宗棠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对陕甘回变的处置，“事关君国兼涉中外，不能将就了局，且索性干下去”。他在兰州督署时，已考虑到下一步对付新疆变乱的问题。为了迷惑敌人，他故意装出不理政事的样子，在督署后院开辟菜圃，每天短衣赤足，抱瓮浇水，悠然自得地来往于田垠上，并在门上贴上楹联：“闭门种菜，开阁延宾”，一派闲暇和祥的气象。其实，他内心是担心有新疆方面派来密探打听官